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课题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 辽宋金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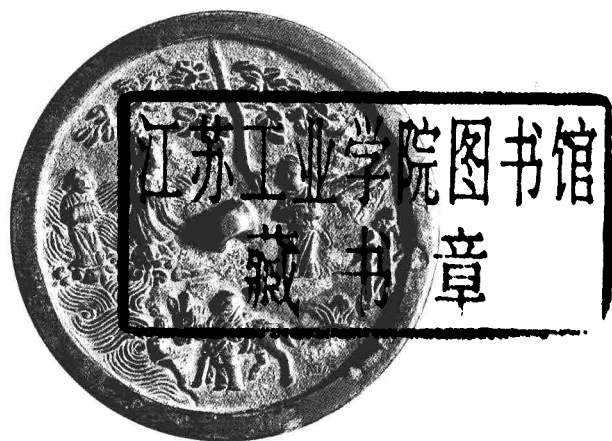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 辽宋金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辽宋金卷 /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8-12122-9

I. 新… II. 新… III. 新疆—地方史—辽宋金元时代—文集 IV. 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038 号

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830001
印刷：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83 千字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38.00 元

编者的话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对新疆历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疆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提高各族人民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具有现实意义。

《新疆通史》是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是自治区文化建设的奠基工程。为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写好《新疆通史》,我们从广大专家、学者发表的上万篇论文中,选出了 363 篇,编辑成册,分 13 卷 15 册出版,本卷为《辽宋金卷》。

我们主要是从通史的角度来选编论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论文选定以后,我们征求了作者的意见。除少数论文作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补充外,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原文照录。

由于我们的水平、接触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编者

2008 年 9 月

目 录

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	刘迎胜(1)
《宋史·龟兹传》补正	
——兼论高昌回鹘王国中的双王制	程溯洛(37)
张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关系	荣新江(47)
高昌回鹘与阿萨兰回鹘	
——兼论其与辽、宋的关系	华 涛(59)
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初期农业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	程溯洛(67)
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	魏良弢(74)
“條贯主”考	黄时鉴(90)
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	钱伯泉(94)
黑汗朝名称考:兼辨黑汗非喀喇汗译名	蒋其祥(105)
喀喇汗王朝祖先传说的历史解读	华 涛(113)
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	
.....	张广达(129)
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	华 涛(145)
喀喇汗王朝经济的几个问题	魏良弢(163)
《福乐智慧》中的自然哲学观念	
.....	阿布都秀库尔·买买提依明 马德元译(179)
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	
.....	张广达 荣新江(192)
五代宋初于阗王统考	孟凡人(213)

《宋史·于阗传》中的几个问题补证 程溯洛(231)

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 荣新江(255)

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

——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 殷 晴(267)

西辽史新证 赵俪生(286)

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 周良霄(299)

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陈得芝(311)

耶律大石西行纪略 纪宗安(321)

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过程及纪年新探 余大钧(333)

西辽契丹人生活方式考辨 贾丛江(347)

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 魏良弢(356)

9 ~ 12 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

刘迎胜

两千余年来,蒙古高原一再成为建立强大国家的游牧民族的摇篮。公元前 3 世纪,这里出现了强盛的匈奴国,其后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陆续立国于此。中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公元 840 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原先占据蒙古高原的操突厥语诸部逐渐消失,形成漠北草原蒙古化的现象。本文拟从分析历史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期民族迁移浪潮的记载入手,来探讨蒙古、达旦诸部西迁背景。

一、马卫集的记载

1937 年 A. J. Arberry 博士宣布,他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发现了一份波斯麻里兀城(今苏联土库曼共和国马鲁)人 Sharaf al - Zamān Tāhir al - Marwazī(本文译称马卫集)的著作 Tabā' i ' al - hayawān(《动物的自然性质》)的完整抄本。^① 他对此编号为“德里·阿拉伯文 1949 号”(Delhi, Arabic 1949)抄本的初步勘同认定工作,为蒙古时代波斯史家奥菲('Aufi)从马卫集著作中摘引的七段引文所完全证实。伦敦大学教授米诺尔斯基将此书的阿拉伯文原文誊抄出来,并与其英文译文合璧刊行。^②

马卫集在其书之第九章《突厥》中,提到了当时发生于北亚草原的一系

① 见《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R·A·S), 1937 年 7 月, 481 ~ 483 页。并见米诺尔斯基(V·Minorsky)《有关 11 世纪中亚的穆斯林新史料》(Une nouvelle Source musulmane sur l'Asie Centrale au XI^e siecle), 宣读于“碑铭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见 Comptes - rendus des Séances, 1937 年 10 月 1 日, 317 ~ 324 页。

② V·Minorsky, Sharaf al - Zamān Tāhir Marw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 1942 年, 伦敦。

列互为因果的民族迁移运动,其文如下:

“Qūn(也)属于他们(按指突厥);这些人因害怕契丹汗而从契丹之地来。他们是聂思脱里教徒,因草场的压力,从他们的故乡迁移过来。火赤哈儿(Qochqar?)之子也斤赤(Äkinji)花刺子模沙就出自他们。追踪着 Qūn 的是一支称为 Qāy 的人,他们的人数以及力量都比他们(按指 Qūn)众多和强大,将他们(按指 Qūn)从这些草原驱逐出去。他们(按指 Qūn)于是移到了 Shāri 之地,而 Shāri 人则迁入突厥蛮(Türkman)之地,突厥蛮则依次进入虎思(Ghuzz)国的东部。虎思突厥人于是迁移到佩奇内克(Bajānak),靠近阿儿马尼(Armenian?)海岸。”^①

马卫集的这一段记载,在蒙古统治时代已为波斯史家奥菲译为波斯语。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 19 世纪末在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册(史料部分)99 页中,将奥菲的波斯文译文刊出,引起了中亚学界的重视。此后,马迦特(Marquart)又在其《论库蛮民族性》(über das Vilkum der Kommanen)中,再次刊出,并附详尽的评注。伯希和在《库蛮》(A propos des Comans,载《通报》,1915 年)中,米诺尔斯基在马卫集书的英译中,都对马卫集的这一重要记载进行了研究。在上述诸位学者中,以米诺尔斯基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

二、关于 Qūn 与浑勘同之问题

从马卫集的记载看,这次民族迁移的浪潮是从一个称为 Qūn 的部落集团开始的。Qūn 族离开故土有两个原因:(1)对契丹可汗武力的畏惧。(2)原有的牧场太狭窄。位于 Qūn 族与契丹人之间的是 Qāy 族,Qūn 和 Qāy 原先都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部。细细品味马卫集的描述后可看出,Qāy 族攻占的并不是 Qūn 族西迁后腾出的故居,而是 Qūn 人离开故土后所占据的新牧场。但在巴托尔德、马迦特和伯希和所使用的奥菲的波斯译文中,却将马卫集的这段记载表述为:Qāy 族将 Qūn 族从自己的牧场驱走(az marā‘ī - yi khud dūr kardand),也即把 Qūn 人从 Qāy 族自己的牧场邻近驱走。^② 因此,根据马卫集的记载,我们似可这样解释:契丹人的兴起引起了牧场的重新分

① 《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以下简称“马卫集书”),阿拉伯文,18 页,英译,29~30 页。阿儿马尼(亚美尼亚)的译名见《回回药方》。

② 参见马卫集书,96 页,注(1)。

配,Qūn族在强邻压迫之下向西迁移。他们曾在蒙古草原某处驻足,也许想留在那里,但由于受到他们后面,也就是东方一个更为强大的部落Qāy人的攻击,不得已再度西迁。Qāy人是否一直追踪他们不太清楚。

在穆斯林地理学家中,比鲁尼提到了Qūn族,他说:“第六地带始于东突厥人的地区,诸如Qāy、Qūn辖戛斯、Kīmak和九姓(Toghuzghuz)”^①。由于在一份极为古老的奥菲波斯文译文抄本中,Qūn的名字写作Qry,^②米诺尔斯基曾猜测,Qūn乃指蒙古部落豁里(Qūrī,唐代之骨利干)。大约与米诺尔斯基同时,巴托尔德也探讨了Qūn的问题。由于在有的抄本中,奥菲抄本中的Qry这个词,因为音点漏置而被写成Fry,遂使巴托尔德联想到突厥词“狼”(būri),由此他认为Fry的写法更可靠。^③但随着奥菲波斯文译本所源出的马卫集书阿拉伯文本的发现,人们从阿拉伯文原文中看到,这个部落的名称被明确地拼作Qūn,于是这些推测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米诺尔斯基曾就Qūn的族属问题请教过夏伦(Haloun)教授,夏伦认为,由于吐谷浑在汉文史料中常略称为吐浑、退浑,甚至只称为浑,所以Qūn可能是吐谷浑。查检史籍,其中确有吐谷浑简称为浑的情况。例如《隋书》卷83《吐谷浑传》录隋文帝言:“浑贼风俗,特异人伦”(标点本,1843页);同书卷67《裴矩传》亦记裴矩向隋炀帝进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标点本,1580页)。很明显这些只是汉族文人笔下因文字修饰需要对吐谷浑的略称。吐谷浑不可能自称为“浑”,就像突厥人不可能自称为“厥”一样,敦煌文书和其他史书确也曾不断地提到过“浑”。例如,《张氏勋德记》残卷云:“河西创复,犹杂蕃浑”。又斯坦因掠走的一份唐咸通九年(869)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帖里文书记曰:“河西诸州,蕃浑、唃末、羌龙狡(交)杂”。《张议潮进表》中亦曰:“今不知郤□□杂蕃浑”。此外黄巢起义时,唐泾原节度使张均“说蕃浑与盟”。尽管这里的“浑”(蕃浑)的确很像是吐谷浑的略称,但由于源出于徒河鲜卑的吐谷浑人是一支操某种蒙古语的部落这一点几乎已成定论,而按马卫集的记载,Qūn应是突厥人。因此夏伦教授关于Qūn可能是吐谷浑的意见是站不住的。米诺尔斯基考虑把Qūn比定为铁勒诸部中的“浑”,但他

① Biruni, Tafhīm, 写于伊斯兰太阴历四二〇年(1029年), Wright 刊本, 145页。转引自马卫集书, 96页。

② 这份奥菲译文抄本收藏号为:不列颠博物馆, 东方·2676 (Br·Mus·Or·2676)。

③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罗致平汉译本, 119页。

后来否定了这种意见。^①

笔者的意见与米诺尔斯基恰恰相反,Qūn可能就是浑。

如果不考虑将浑与匈奴挂钩的问题,则浑的名称首见于《隋书》卷 84《北狄·铁勒传》:“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乐河北有仆骨、同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新旧《唐书》在列举十五种散居漠北的铁勒部落时,也提到了浑,^②足见它是一个活动在我国大漠以北的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唐贞观二十年(646),薛延陀破灭后,铁勒诸部酋长入观,次年太宗于其他地置六府七州,其中浑中所居地为皋兰州^③(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流域),后分为东、西二州。后突厥汗国兴起,默啜可汗取铁勒故地,浑与回纥、契苾及思结等四部被迫度至漠南,徙居甘(今张掖)、凉(今武威)之间,不久又返回漠北。浑部虽与回纥关系密切,但他们并不属于回纥。回纥内有族姓九,再加葛逻禄、拔悉密,共称十一姓,与仆骨、浑等六部为“相等夷”。此六部不列于回纥诸姓之中。^④公元 840 年回鹘汗国崩溃后,浑部似乎并没有随回鹘远走。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二月,史籍中仍有“突厥浑解楼”遣使者来的记载。^⑤这时浑显然与其他突厥部落混居在一起。

今藏法国国民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编号为伯希和 2471(P. 2471)的敦煌和田塞语卷子中提到了一个词 hūnvāstā,据贝利释读,这是部名 hūna 的复数加了方位格标志 3stā,义为“朝着 hūna 每”。贝利对 hūna 部的勘同提出了三种可能性:(1)匈奴;(2)浑部;(3)吐谷浑的略称。但他不能定夺[见《一段有关甘州突厥人的和田文史料》(H. W. Bailey: A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载《大亚洲》AM,1949 年,和田文拉丁转写,第 38 行,英译,34 页及 48 页注释(38)]。笔者认为,这个 hūna 应指河西的浑族。

马卫集说,Qūn 族是在契丹的武力压迫下西行的。查契丹历史,辽太祖

① 以上有关浑的史料参见:《敦煌石室遗书》第一集《张氏勋德记残卷》;万斯同《唐代文献丛考》,91 页;斯坦因敦煌 6342 号卷子及周伟洲:《吐谷浑史》;《新唐书》卷 225 下《黄巢传》。夏伦和米诺尔斯基意见参见马卫集书,99 页,注(3)。

② 《旧唐书》卷 199 下《北狄传·铁勒》,《新唐书》卷 217《回鹘传》。

③ 《旧唐书》卷 195《回纥传》,《新唐书》卷 217 上《回鹘传(上)》,《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6244 页。

④ 《旧唐书》卷 199 下《北狄·铁勒传》,《新唐书》卷 217 上《回鹘传》。

⑤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旧五代史》卷 32;《新五代史》卷 5。

耶律阿保机在平定了左近诸部后,开始向西扩张。神策元年(916)秋七月,他“亲征突厥、党项、吐谷浑、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① 其中突厥可能指的就是浑以及与浑有关的铁勒、突厥部落。如此说不误,则契丹的向西扩张,与马卫集所述 Qūn 族的西迁应是同一件事。天赞三年(924 年),契丹兵再“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② 浮图城已在北廷一带,故浑族(Qūn)的西迁应在此以后。

三、Qāy 与奚之关系

在马卫集所提到的这个一连串的民族迁移的链环中,位于最东方的,是一个被称为 Qāy 的部落集团。Qāy 是什么人? 在阿拉伯文中,Qāy 和契丹(Qitāy)这两个名称在写法上虽易于混淆,但 Qāy 族的名称在一些穆斯林史料图籍中,例如比鲁尼的《东方民族编年》和可失哈里的《突厥语大辞典》等中,曾一再出现,足以说明 Qāy 的名称不是契丹的讹写。

在可失哈里的《突厥大辞典》中,曾数次提到 Qāy 这个部落名称。其中第一次是在作者列举从西向东的突厥部落时,其文曰:

“关于突厥人的分类以及略述其诸部概要

我(按指作者可失哈里)将概述东方世界每个部落的地理位置。他们将按(从西)向东的顺序被列举出来,包括异教徒和穆斯林,从那些最靠近拂菻(Rūm)的开始列举。首先是佩奇内克(Bāchnāk),然后是钦察(Qifchaq),然后是乌护(Oghuz),然后是 Yemāk(按即 Kimāk),然后是巴只吉惕(Bashghirt),然后是拔悉密(Yasmil,按即 Basmil,在《突厥语大辞典》阿拉伯原文中,所有的 B 都写作 Y),然后是 Qay,然后是叶护部(Yabāqu),然后是达旦(Tatār),然后是辖戛斯(Qirqiz),后者离秦(Sin 按指中国)最近。”^③

将可失哈里的上述记载与比鲁尼所记相比,可发现 Qāy 族的居地发生了变化。但可在失戛里的上述记载中,巴只吉惕以东的部落的排列,并非严格按照从西向东的顺序,例如将辖戛斯置于达旦之东。所以当时 Qāy 的位置仅据可失哈里的上述记载,还不能确定。

① 《辽史》卷 1《太祖纪》。

② 《辽史》卷 2《太祖纪》。

③ 《突厥语大辞典》英译本(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卷 1,哈佛,1982 年,82 页。

在《突厥语大辞典》作者所附圆形地图中,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与亦马儿河(今鄂必河)之间,分别标注着“处密人之居地”以及“Qāy人之居地”。明伽纳(Mingani)在1933年5月1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刊出了一份公元1150年绘出的叙利亚文地图。图中在所谓第六区的东限标明:“辖戛斯、Qāy和Qun;突厥人和蒙古人之地。”^① 尽管学者们怀疑它的绘成年代,但此图中Qāy族的位置与《突厥语大辞典》所记却是大致相同的。

可失哈里说Qāy族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② 作者在列数诸拥有自己语言的部落时,又一次提到了Qāy族: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都是定居民族。在游牧民中有处密(chömül),他们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ratāna),但也懂突厥语;Qāy,叶护部(Yabāqu)、达旦和拔悉密也是如此,这些集团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也都懂突厥语”。^③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可失哈里有关“突厥人”的概念是很含混的。他所列举的突厥人原本所有的二十个部落,包括了根本不属于突厥族的达旦、唐兀惕、契丹和桃花石(宋)。

看来Qāy人与达旦等族一样,当时都不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但至蒙古时代,拉施都丁作《史集》时,Qāy人已完全被视为突厥部落。《史集》记乌古思可汗事迹时,将乌古思部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孛祖黑(būzuq),以三个年长的儿子率领。属于孛祖黑的长子坤汗(kün, khan, 突厥语,译言太阳汗)之长子名Qāyī,其义为健壮者。^④

米诺尔斯基猜测,Qāy族即汉文史料中的奚人。尽管在突厥文《阙特勒碑铭》中,奚人被称为Tatabi,但在汉文史料中,他们始终被称为库莫奚或奚。奚的名字亦见于巴黎国民图书馆收藏的1283号藏文卷子,其文曰:东境有一部落,蕃人称之为He,汉人称之为He-tse,突厥人称之为Dad-pyi。部落酋长名Cong-bong-ya^⑤。库莫奚之名首见于《魏书》卷100,他们是鲜卑人的一支。公元344年,十六国中的前燕慕容皝击败这支鲜卑人,部落析

① 参见马卫集书,97页。

② 《突厥语大辞典》英译本,卷2,手稿514页。

③ 《突厥语大辞典》英译本,卷1,手稿,25页。

④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140~142页。

⑤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介绍(附译文)》,《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2期,9页。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敦煌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105页。

为三:宇文、契丹和库莫奚。库莫奚居于契丹之西,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之南。隋以后只称奚。“奚”字,隋唐时为匣母蟹韵,开口平声四等,拟音yiei。从族名和所居地来判断,马卫集和比鲁尼所说的Qay,很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奚。

奚人在隋时已分为五部,曾役属突厥。入唐后,唐太宗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五部各置州。奚与契丹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国互为表里,号曰“两蕃”^①。唐末光启中(885~887年),契丹贵族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达靺、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②。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刺的(德祖)曾俘奚王部曲之半七百户^③。耶律阿保机任挹马狝沙里职时曾伐“六奚”克之^④。至唐天复元年(901),契丹贵族钦德称汗后,耶律阿保机受命多次出征奚部^⑤。故《新唐书·奚传》曰:“契丹方强,奚不敢抗,而举部役属。虜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妣州(今怀来)北山(今张北一带),遂为东西奚”。奚贵族去诸的事迹亦见于五代史籍:“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妣州,依北山射猎……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⑥。

907年耶律阿保机即位后,加强了对奚的征服。910年,“乌马山奚库支”等叛,契丹“讨平之”。次年,阿保机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⑦。契丹的征伐并未能使奚人屈服。他们与后唐往来以为援。奚贵族去诸之子曾收纳契丹叛臣^⑧。天赞二年,阿保机“讨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⑨。直至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立晋(936年)以后,西奚才降服于辽^⑩。奚贵族成为契丹国内有地位的世贵,辽中期以后,辽朝以奚王牙帐之地为中京,府曰大定。

① 《旧唐书》卷199下《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5354页。

②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827页。

③ 《辽史》卷1《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页二:“德祖俘奚七千户”。卷33《营卫志》,387页:“俘其拒敌者七百户”。

④ 《辽史》卷1《太祖纪》,1页。

⑤ 《辽史》卷1《太祖纪》,2页。

⑥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909页。

⑦ 《辽史》卷1《太祖纪》,4页。

⑧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909页。

⑨ 《辽史》卷2《太祖纪》,18页;卷33《营卫志》,387页。

⑩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910页。

太宗以后直至辽末,史料上不再见有奚人大规模反叛契丹之事,奚人的六部也完整地保留着。追踪 Qūn 族的 Qāy 人,或许是契丹兴起之初,因不堪忍受压迫而西行的一部分奚人,或许是受命于契丹贵族,进攻 Qūn 人的一支奚人部族军。在辽太祖西征战事中,奚部族军是从征的劲旅。天显元年(926年)“以奚部长勃鲁思,王郁自回鹘、沙陀、吐蕃、党项”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①。追踪 Qūn 族的 Qāy 人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汉文史料中没有西征奚军长驻彼方的记载,如果我们要肯定米诺尔斯基把 Qāy 比定为奚的猜测,则只能假定有一支奚人迁移到了西方,而汉籍漏载此事。本文前面提到,《史集》把 Qāy 说成是乌古思可汗的长子的后裔。乌古思可汗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如果说其传说能够给我们点启示的话,那就是:即使 Qāy 人确实起源于奚人,那么当 Qāy 人定居于西方后,他们也与自己所源出的那支 Tatabi(库莫奚)没有什么联系了。

四、花刺子模沙也斤赤

辽代中期,契丹人仍不断对西北用兵。开泰元年(1012年)耶律化哥“伐阻卜,阻卜弃辎重遁走,俘获甚多。帝嘉之,封郾王”。耶律化哥归阙后,辽西北边吏向朝廷奏报,守兵粮匱马乏,势不可守,辽廷遂遣耶律化哥再次经略西境。“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也儿的石河),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突厥语地名 Bir-baliq),遇阿萨兰回鹘,掠。都监袁里继至,谓化哥:‘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②上面提到的白拔烈(Bir-baliq),即元代之白八里城,亚美尼亚国王《海敦东行记》所载之 Berbalex。bir,突厥语,译言一,baliq,突厥语城也。《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中称作独山城,当为此名之意译,其地位于今新疆木垒县境。阿萨兰,突厥语 arslan,意为狮子,这是突厥、回鹘诸族常见的人名和称号。从这支阿萨兰回鹘的活动地在独山城一带判断,当为高昌回鹘无疑。耶律化哥第二次出兵的行路线,显然是沿漠北西行至也儿的石河,再南下入依附于辽的高昌回鹘北境。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上文提到的“阻卜”和逆命居翼只水上的“蕃部”与否与奚(Qāy)或 Qūn(浑)有关。但辽兵的这类军事行动,无疑会给停留在漠或漠西某处的

① 《辽史》卷2《太祖纪》,22页。

② 《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

Qūn 族以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继续西迁。

根据马卫集记载,曾任塞尔柱算端国内花刺子模沙的也斤赤(Äkinchi)是 Qūn 族人。这条史料对判断 Qūn 族西迁时间的下限有决定性的意义。

也斤赤(Äkinchi)的名字是纯粹的突厥语,意义农民,播种者。这个词是由突厥语 äki(谷物、种籽、耕地),加上表示职业、身份的突厥语附加后缀 -chi 构成的。后来蒙古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①。也斤赤的父亲名称为火赤哈儿(Qochqar),在突厥语中义为“公羊”。也斤赤的名称透露出 Qūn 族人所受到的农耕文化影响。

出自浑族(Qūn)的也斤赤担任花刺子模沙一事并非传闻,花刺子模诸沙中确有也斤赤其人^②,他的事迹零散地保存在伊本·阿西儿的《历史大全》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传》中。志费尼说火赤哈儿之子也斤曾是塞尔柱算端桑扎儿(Sanjar)的奴隶^③,而伊本·阿西尔则说他是塞尔柱算端 Bark - yaruq 的奴隶,而正是这位算端任命他为花刺子模沙。Bark - yaruq 算端的统治始于公元 1094 年 10~11 月间。他可能是在推翻其暴虐的叔父阿儿思兰·阿儿浑之后,首次视察呼罗珊时,任命也斤赤为花刺子模沙的。Bark - yaruq 算端 1096 年 4 月抵达彼处,在那里待了七个月以上。也斤赤汇集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然后去麻里兀城见算端,但算端已西返。也斤赤本人在一次欢娱活动中被两名敌对大臣所杀^④。按志费尼的说法,也斤赤的继任者忽都不丁(Qutb al - Dīn)是在公元 1097~1098 年登位的^⑤。马卫集本人是麻里兀人,他关于也斤赤出于浑(Qūn)部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也斤赤之前的花刺子模沙是呼罗珊木儿加布河流域的突厥族人纳失的斤(Nash - tehin),而其后任忽都不丁则是纳失的斤之子。尽管也斤赤的任期十分短暂,但他对整个塞尔柱算端国东北部花刺子模事态的了解,必然是获得这一任命的先决条件。显然,至少在也斤赤之父火赤哈儿时代,浑(Qūn)族已是花刺子模一个势力显赫的部族,非如此,也斤赤不可能获得塞尔柱算端的任命,而成为插在纳失的斤父子之间的花刺子模沙。以也斤赤

① 拉施都丁:《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册,汉译本 259 页。

② 《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卷 4, C·E·Bosworth《花刺子模诸沙》条,1067 页。

③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330 页。

④ 见马卫集书,101 页。

⑤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330 页。将奥菲译文中的也斤赤,与花刺子模沙也斤赤勘同的工作,首先是巴托尔德进行的(见《突厥斯坦》英译,324 页,马迦特 1914 年在《论库蛮族》中也独立地进行了讨论),见马卫集书,102 页,注 1。

壮年去世,逝年约 40~50 岁,而其父火赤哈儿长二十岁计,则浑(Qūn)族在花刺子模强盛起来的时代,应在 11 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然,这个时间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耶律化哥的西征,相距过于短了一些。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似可肯定:浑(Qūn)族从 10 世纪上半叶受契丹人压迫而离开故土,到落脚于花刺子模并强盛起来,其间经过了约一百年时间。米诺尔斯基已认识到,这样巨大的从我国蒙古高原东部开,一环套一环直至黑海的民族迁移浪潮,不可能是一个短时期里的事情。其整个过程也不可能从外界某一个确定的地点观察到。他设想,这个民族迁移的链环也许分为两部分,即:Qāy—Qūn—Shāriya(撒里之地)和突厥蛮—乌护—佩奇内克。而这两部分的联结点或许在花刺子模^①。火赤哈儿和也斤赤父子很可能亲自经历,并从内部和外部观察到了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迁移,而将自己所见、所历、所闻的情况在某种场合叙述出来,为马卫集所知。

五、浑(Qūn)族与聂思脱里教

13 世纪叙利亚史家巴儿·赫卜烈思(Bar Hebraeus)的《圣教编年史》,引述 1009 年波斯麻里兀城聂思脱里教主致报达城(今巴格达)教长术安六世函,其中提到克烈王与其臣民受洗礼事。由于马卫集提到浑族是聂思脱里教徒,米诺尔斯基推测浑(Qūn)是克烈部或汪古部的一部分,或者浑(Qūn)是我们所熟悉的某一个以另一个名称闻名于世的突厥部落的一部分。其理由是:聂思脱里教总部,不可能对一个像浑这样重要部落皈依聂思脱里教毫无所知^②。他据此再推测浑族(Qūn)西迁在公元 11 世纪初叶以后。米诺尔斯基的上述推测有重要的缺陷,他只在人们所熟知的突厥、蒙古部落中寻找浑族(Qūn)的踪迹。此外,他把浑族(Qūn)后来在花刺子模的重要地位向前推,设想这个部落在西迁以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实际上,信奉聂思脱里教而其名称并未见于景教总部文献的突厥、蒙古部落并不在少数,例如畏兀儿、乃蛮、汪古和一些蔑儿乞人等。目前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浑族(Qūn)接受聂思脱里教的时间早于或晚于克烈人。预先假定浑族(Qūn)接受聂思脱里教晚于克烈部,是不必要的。笔者的推测是:(1)浑族(Qūn)可能西迁开始以前已经是景教徒;(2)他们也有可能是在西迁途中,驻足某地,

① 见马卫集书,102 页。

② 见马卫集书,98 页。

与某个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落,例如克烈、汪古或乃蛮等为邻或杂处时,变成景教徒的。

在本文中,笔者已把 Qūn 比定为汉籍中的浑部。如果仅据马卫集的记载,会得出浑人(Qūn)举族西迁的结论。但实际上仍有浑人留在漠西与乃蛮和畏兀儿等为邻。12、13 世纪之交,蒙古兴起,漠北诸部互相兼并残杀,草原大乱。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后,屈出律率乃蛮余部投奔西辽,亦有一些乃蛮、浑部及其他部落残种流入中原,为金政府收容,编为“忠孝军”。《金史》卷 123《忠义·完颜陈和尚传》云:“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这里把浑与信奉景教的回纥、乃蛮等并列,可为马卫集称浑是聂思脱里教徒的一个旁证。直至元代,仍有浑人散居河西。《元史》卷 170《袁裕传》记:“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这些浑人的下落,尚有待于追寻。

有关 Shari、突厥蛮和乌护的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这里从略。

六、Kimāk 部中的达旦人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迁移运动,原因不外乎扩张、战败、或寻找牧场。仅见之于汉籍的,西汉时有月氏、乌孙的西迁,东汉时有北匈奴远遁,魏晋时有高车西行,唐代又有歌逻禄和回鹘的西迁,毫无疑问,除了这些见诸于汉籍的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西迁移活动外,还有许多为汉籍所漏载的,例如浑(Qūn)部西迁这样的行动,或小规模的,零星的迁移运动。公元 840 年黠戛斯灭回鹘后,经过约三百年时间,到《元朝秘史》时代,漠北草原基本上蒙古化了。由于史籍中并未明确记载达旦、蒙古诸部的西迁活动,所以漠北草原蒙古化的历史,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使用的主要是汉文史料。公元 9 世纪以后,穆斯林地理科学繁盛一时。在一些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保留了有关突厥、蒙古诸部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著作中寻找鞑靼、蒙古诸部西迁的蛛丝马迹,将它们与散见于各书的汉文记载相比较,无疑会促进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写于 1050 年前后的著作《报导的装饰》,提到了一部分达旦人向西迁移,进入也儿的石河流域,建立 Kimāk 部落的故事,其文曰:

“至于诸 Kimāk 人(Kimākiyān),其来源是这样的:诸达旦人(Tatārān)的首领死后遗下二子。长子占据了君位,幼子妒忌其兄。幼弟名设(Shad)。